

他是黄兴、孙中山最信任的私人联络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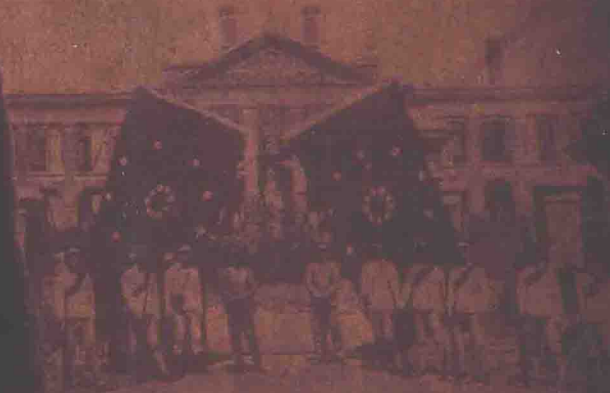
也是蒋介石称帝前“小皇帝”

更是独揽大权却又被迫“下岗”的“湖北王”

民国第一谋士

何成浚

帅文清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民国第一谋士 何成浚

帅文清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帅文清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216-08144-3

I. 民… II. 帅… III. 何成浚(1882~1961)——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788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黄 沙

封面设计:董 昀

责任校对:游润华

责任印制:王铁兵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333千字

版次:2014年4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8144-3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21

插页:3

印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谋士(代前言)·····	1
赴日习武的清末秀才·····	7
暗助民军的清兵先锋·····	21
黄兴最信任的私人代表·····	32
孙中山最倚重的说客·····	60
彷徨中隐居上海滩·····	92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总代表·····	102
成功稳住孙传芳·····	113
“宁汉分裂”上蒋氏战车·····	129
“济南惨案”谈判险些送命·····	145
整编逼出“东陵盗宝”案·····	156
牌桌上统一东北·····	163
三战三捷 赢得鄂省主席·····	172
中原大战 登人生辉煌顶点·····	185
边区“剿共” 命运开始逆转·····	196
“九头鸟风波”始末·····	215
回报家乡 创办列山中学·····	223
百般无奈 又做短命省主席·····	236
与李宗仁的一场纠纷·····	249
鄂北“天河口民变”纪实·····	260
程泽润案审判经过·····	271
心力交瘁 提前辞一切职务·····	292
流落海岛 客死他乡·····	312
何成浚先生生平大事记·····	329
主要参考书目·····	334

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谋士



（代前言）

何成浚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无论是研究民国历史，还是研究国民党党史都不可能绕开何成浚，甚至可以说，没有何成浚的存在，民国的历史和国民党的党史都可能会又是一个样子，因为他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将领身上，而对何成浚这类在北伐战争以前作过重要贡献而在抗战初期就隐退二线的高级将领则关注得甚少，这就像导演和演员的关系，观众看到的只是演员，而起重要作用的导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何成浚为人、做官、处事都是极其低调的，从来不与人争功，即使是他还在任的时候，有人在大会上把他劝说“王永泉反正”的经过说得面目全非，他听后也只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发了一点点牢骚，第二天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所以，他做了很多大事却没有一个人知晓，有的甚至是张冠李戴，把他的功劳记到别人的账上去了。本书力求给何成浚一个公道。

关于书名，我很是踌躇了一番，我在将近二十年研究何成浚的时间里，一直希望能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但要下决心却很难。

一些史料称他为“湖北王”，因为他是民国时期湖北省最有实权的人物，曾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湖北省党部特派指导员、省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独揽湖北省党政军大权，但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不似阎锡山经营山西几十年，形成了“王”者之气；也不像龙云那样在云南从最基层的军官做起，等做到一方诸侯的时候，全省都是他的人，能够一呼百应。他带的部队很多人不是湖北人，又不是“亲生亲养”从小带大的，有些人甚至还瞧不起他，时不时还去告他的阴状。

台湾地区史学界也有人称他为“和平将军”，因为古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说，而何成浚这个国民党陆军上将，并不是在战场上立下了什么功劳，而是靠谋略决胜于千里之外。如他只身一人劝“王永泉反正”，求得千军万马回师广州救援孙中山；再如他只身一人稳住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使北伐军长驱直入，直捣武汉，一举打垮吴佩孚；又如他只身一人北上唐山，靠一纸委任状使白崇禧的几十万大军立即倒戈；还有，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得直鲁联军的主将徐源泉拱手投降，京津地区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北伐军的天下……所有这一切都能证明何成浚确实可以称为“和平将军”。然而，他在大别山和洪湖两地“围剿”红军，手段也极其残忍，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见一个杀一个，所有的房屋见一间烧一间，洪湖的水都被染红了，岂可称其为“和平将军”？

有一天，我在书市上发现一本名叫《蒋介石的十大谋士》的书，其中列有张群、杨永泰、陈布雷等，讲谋略，讲贡献，这些人与何成浚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再说，何成浚不仅跟蒋介石谋划过大事，还给孙中山、黄兴当过重要的参谋，无论是从时间上、贡献上还是级别上看，何成浚都应该排在张群等人的前面。所以，我就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说何成浚是民国时期的第一谋士？近来，我又购得一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十说客外传》，全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十位著名“说客”，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有子贡、苏秦、张仪、范雎、陈轸5位，秦汉时期有酈食其、蒯通、陆贾3位，剩下2位是唐朝的孔巢父和民国的何成浚。自中唐后千余年间，为什么只有何成浚入选？说明他至少在该书作者眼中是民国时期的“第一说客”，这正好支持了我的想法。不过，我以为，何成浚对民国的贡献不仅仅是外出当“说客”，还在幕府之中为“主帅”出过不少好主意；再者，“说客”一词在古代可能是褒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果不把他与古代著名“说客”们一起列举，单说他是民国时期“说客”，可能会让人有“只会耍嘴皮子”的误解。

综上所述，我以为还是将书名定为《民国第一谋士何成浚》为好。

从时间上说，他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谋士。1911年辛亥首义，他是清朝陆军部第一批派往武汉镇压起义军先头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却利用自己的谋略在暗中巧妙地帮助起义军扩大规模，使这个看似意外之事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大事件。1913年夏，他跟黄兴一起在南京策划了夜闯江苏都督府、枪逼程德全“革命”的一场载入史册

的好“戏”，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任讨袁军总司令，何成浚任参谋长，这是他第一个有史可查的正规“谋士”职位。1924年，孙中山在韶关组织北伐，任命谭延闿为总司令、何成浚为总参谋长兼左翼总指挥，这是他第二个有史可查的正规“谋士”职位。1926年春，国民党组织广州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委任何成浚为上将总参议，因地下工作的需要又立即改为“联络总代表”，此后又做过国民政府第一任参军长，当过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第二任总参议，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的十大谋士》这本书上说的张群、杨永泰等人才刚刚出道，在何成浚手下做联络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称何成浚为民国史上第一谋士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再从贡献上看，何成浚也是功劳最多的第一谋士。辛亥革命，如果不是何成浚按兵不动，起义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问题。1922年，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险些置孙中山于死地，孙只得在永丰舰上避难。何成浚在舰上临危受命，只身一人化装潜入福建南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得他的同学王永泉投身革命，并资助孙中山唯一可用的许崇智军回师广州，使孙中山化险为夷，逃往上海，若不能说得王永泉反正，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北伐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孙传芳在浙（含沪）、苏、赣、闽、皖握有几十万重兵，直接威胁着两广，且不说孙传芳出兵与北伐军为敌，就是他公开宣布支持他的老上司吴佩孚，北伐军就不敢轻易出广东。作为蒋介石总代表的何成浚亲自出马，利用他和孙传芳的同学关系，住在孙传芳的府中，凭他一张嘴，说得孙传芳对吴佩孚坐视不理，让北伐军顺利攻下长沙和武昌，回过头来又灭掉了孙传芳。如果没有何成浚的机智应对，这段历史又是不能假设的。后来，何成浚又成功说服了徐源泉、孙殿英归顺北伐军，使北京、天津没费一枪一弹就被北伐军占领。紧接着他又出使东北，让东北三省在规定的时间内插上了“青天白日”的旗帜。1929年至1930年，是何成浚最忙活的一段时间，他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并亲自带领收编的杂牌军走上前线，为蒋打赢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这些都是看得见、有史可查的，是那些“十大谋士”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再从个人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何成浚也应该排在“十大谋士”之前。因为何成浚自革命以来，一直在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主帅的身边，他本身就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谋划的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直接影响着革命历史的进程。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

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陆军上将。所以，我们说何成浚是民国时期的第一谋士毫不夸张。

另外，我们从一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看到，何成浚一生为人谨慎，不事张扬，无论是任文官还是做武将，平日里都爱穿一身长布衫，文静和蔼，有人甚至说他像一个算命先生，轻言细语，毫无霸气，完全是一副谋士形象，所以我斟酌再三，觉得还是用“民国第一谋士”来定位他要合适一些。

怎样评价何成浚的历史功过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前面说过的原因，过去很少有人去专门研究这个在抗战初期就退居二线的人物，一些散落的零星文字大多是“文革”思维的产物：只要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就贬的多、褒的少，看不清他的历史真面目。

我在研读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发现何成浚并不像过去某些文章说的那样“坏”，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来看，他还做过很多好事，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应当说他曾经还是个“好人”。

比如说他跟随黄兴首批加入“同盟会”、暗助辛亥首义民军、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发动“二次革命”等；比如说他跟孙中山一起发动“护法战争”、驱逐鄂督王占元、劝说王永泉反正、组织韶关北伐等；比如他为蒋介石的北伐稳住孙传芳、瓦解张宗昌、拉拢阎锡山、说服张学良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跟孙中山、黄兴做事我们可能好理解一些，后来跟蒋介石做事，我们为什么也说具有积极意义呢？因为打倒北洋军阀、将中国统一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既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有了何成浚的谋划，既缩短了战争期限，又减少了人民痛苦。这样说来，他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中国得到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了又一次的军阀割据，也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何成浚在家乡随县县城创办了私立列山中学（随州一中前身），在历山镇创办了列山小学，并一直延续至今，为当地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3年，随州一中筹办六十周年校庆，笔者有幸受命研究校史，开始接触何成浚这个人物，并对他早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十几年来，通过收集大陆和台湾的民国史料，基本上理清了他一生经历的主线，觉得应将他的真实经历整理出来，既可还何成浚一个真实的历史面目，也可以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同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何成浚也做过一些有罪于人民的事情,比如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中,他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反共”,并一手策划让夏斗寅向武汉方面放了第一枪;20世纪30年代初,何成浚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湖北“剿共”,先后在鄂豫皖、湘鄂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红军和无辜百姓,我想,历史也会记住这些。

笔者在撰文的过程中,力求尊重历史,一是一,二是二,既不文过饰非,也不无中生有。基于上述观点,笔者在介绍何成浚的经历时,尽量把某一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给予完整的叙述。比如说他受命处理孙殿英的“东陵盗宝”案,本来抓住了直接开挖慈禧墓的师长谭温江,最后却只能不了了之。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军阀混战。人关在阎锡山的辖区内,后来爆发中原大战,阎锡山为了拉孙殿英反蒋,把盗宝的人放了,等把阎锡山打败了,日本人来了,孙殿英又去当了汉奸,再抓住孙殿英已经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何成浚根本就管不了这些,所以也不需要负责任。在叙述中,即使是一些不可考证的细节、心理描写、人物对话,要么是公开出版物中明确记载的,要么出自何成浚本人的自传或是他人的回忆录,极少是来自民间传闻,采用的原则:一是不违背历史事件真实,二是不损害个人性格特征。

何成浚的主要经历是1909年从日本回国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这将近三十年的时光,其中最活跃的黄金时期是1922年夏出使福建劝说王永泉,至1932年3月22日他第一次被迫辞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止的这十年。本书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将他抗战之前的经历尽可能一一介绍清楚。

抗战开始,他到陪都重庆做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法部执行总监,官职仍然是正部级待遇,官衔仍然是国民党陆军上将。但军法部是清水衙门,既没权、也没钱,应该算是退居“二线”了。他一干就是七年,虽然没有办成什么大事,却经手了一些奇事,目睹了一些怪事,使他对所在的党派失去了最终的信任,决定提前退休,“不与他人同流合污”,回随县老家与老农们“把酒话桑麻”去!

从何成浚1942年1月1日到1945年12月31日没有间断的日记看,他虽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中央部长,但因无实权,时时处处受制于人,连自己老家的田产都几乎不保,出门无车可坐,看病无钱拿药,一日三餐也紧巴巴。但是,在重要岗位上的大小官员贪污舞弊是常有之事,只要有

钱过手，便会雁过拔毛，用何成浚的话说就是“文官要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贪污成风，腐败盛行。但作为军委会的最高法官，要惩治一个证据确凿的贪官也并不容易，会突然冒出一个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为他说情，叫你无法下手。有一位部长级的著名高级将领，将证据确凿的罪犯公然藏在家里，门口派上岗哨，还打来电话说，某某在他家里治病，请多关照，叫你哭笑不得，这是不是奇事？他还记录了一件怪事：一位战地医院的中校医生，因原院长提拔，新院长非他莫属，他因怕当这个院长而要求自动降至少校，调到何成浚分管的监狱里去当一名普通医生。何成浚问其原因，他说，做院长必须贪污舞弊，如不贪污上级定不满意，比如说上级找你报销费用怎么办？而要贪污自己又于心不忍，为保全人格不同流合污，只有远离这个院长的岗位。

何成浚晚年正是从这些千奇百怪的案例中预测出国民党政治已到了穷途末日，因此于1945年底作出了提前辞职退休的决定。为了全面反映出他这阶段的思想脉络，笔者便改时间顺序为逻辑顺序，选择了一个蒋介石要他“枪毙兵役署长程泽润”的案件来说明他做官之难；选择了一个因他在家乡个人田产险些不保的事件来反映他“位高无权”的尴尬境况；选择了一个他完整记录的老家天河口的老百姓攻打国民党军队司令部的事件经过来倾诉他对国民党政治无望的哀叹；还选择了一组他对当局心灰意冷并下决心告老还乡的日记来分析他提前辞去党政军一切职衔的主要原因。至于后来去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对他的生平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只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还要说明的是，书中已有数万文字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还有些文章是准备作为独立篇章拿去发表的，所以，这些文章在介绍主人公的经历时，有少量文字与前面按时间顺序介绍的内容有交叉，但为了保持原文结构的完整性，没有对这些交叉的简介作大的删改。

帅文清

2014年2月

赴日习武的清末秀才



1882年6月19日是清朝光绪八年,农历壬午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

这一天,四十八岁的老佛爷和十二岁的小皇帝按宫里头的规矩准备了节日物品。尽管国内还算太平,虽无内忧,却有外患,因为日本人在三年前霸占了历来向大清皇帝进贡的琉球国,并明目张胆地将这片土地更名为冲绳县。尽管西方世界的舆论一直支持中国,但老佛爷和一班文臣武将们慑于对方威力无比的双筒火药枪,理直气却不壮,怎么也不敢大胆地去夺回来,指望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方法去解决,但笔墨官司已打了三年,对方不仅没有物归原主的意思,而且还把贪婪的眼神瞄向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

刚好就在这一年,一直受中国保护的朝鲜国发生内乱,虎视眈眈的小日本便借机插了手,以维护秩序为名出兵朝鲜,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弄得老佛爷脸上一点光彩也没有,所以一向喜欢大操大办的她也对这个节日失去了兴趣。

大清的老百姓不知道老佛爷的心情,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把端午节



何成浚的家乡随县厉山镇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故里

过得丰富多彩。

湖北省北部的随县有一个小镇叫厉山镇,作为一个集镇它并没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特色,全部内容完全在于它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它的得名在于小镇西北边紧邻的一组叫做烈山的山,因为那时候的老祖宗们还没有推行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只管读音有点像而不一定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字形,最初写作“列山”,有时写作“烈山”,还有的写成“丽山”和“赖山”,这可能有点像广东人说普通话,但最后被人们固定下来的、也是今天仍然沿用的是“厉山”二字。



传说中炎帝神农诞生的地方——神农洞

当然,地名仅仅是一个代号,怎样写都无所谓,只要大家能够记下来就行了。但是,这个名字的后面还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因为大量的古籍文字和遗留在厉山上的神农洞、神农碑和小镇上的日照街都证明,公元前3228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正午,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炎帝神农诞生于此。也就是说五千多年前,生活在厉山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已经创造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因而厉

山这个小镇与中国千千万万个小镇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了根本的区别。

镇子东边濒临的一条小河叫厥水河,河的彼岸有一片肥沃的小平畈,平畈之上因为世代生活着很多何姓人家,因此人们称这个集住的村庄和这片平畈为何家畈。

何家畈里的何姓人家在历史上并没有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甚至连一个能称霸一方的大地主也没有,但能自给自足并略有富余的却有几家。直到咸丰年间有一个叫何星三的青年因天资聪颖,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又跟一个老板学做生意,做了几年之后琢磨出了一点生意经的真谛,就萌发了自主创业的理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自立门户当起了老板,靠他的聪明才智一边经商,一边购买土地,一不小心就成为何氏家族的首富,

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已经是全县能够排上名的大户人家。

何星三似乎诚心要与老佛爷作对似的,硬是带头把个端午节过得热火朝天,除了按传统模式割艾、捣艾、燃艾、包粽子、煮粽子、吃粽子之外,还杀了猪,宰了鸡,网了鱼。

当地人把端午叫端阳,这个时间是初夏,有点偏热了,农村刚好是收割完了小麦,插好了中稻秧,有点时间休息调整一下,就喜欢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上街、走亲戚,因为这种举动有点“显摆”的意思,所以当地人又俗称这个习惯为“摆端阳”。有钱人家在这个时候一般是要大宴宾客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节日都是与“吃”联系在一起的,不吃就不叫过节。

当地还有一种风俗,端阳来了天气就很热了,不搞这些强度大的活动,有的地方就去水中赛龙舟,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条件赛龙舟,但也喜欢玩一种与水有关的游戏,当地称其为“蚌蛤精”。

从清晨起,何家畈村中的大场子里围满了人群,锣鼓响个不停,等人聚集得差不多了,“蚌蛤精”的表演也开始了,共有三个角色,一个鹬、一个蚌,还有一个渔夫。饰演蚌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打扮得很鲜亮,她的角色特质就是“显摆”,让人垂涎欲滴,人们称她是勾人魂魄的“蚌蛤精”。她首先出场向观众展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后待在场子中间歇息。饰演鹬的一般是小伙子,他的角色特质是“贪婪”,见了美丽的“蚌蛤精”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露出种种丑态,终于忍不住要上去“吃一口”,没想到却被“蚌蛤精”夹住了嘴。二者搏斗得筋疲力尽时,一个身背破笆篓、手拧破渔网的渔夫出了场,见两个宝贝还在那儿挣扎,大喜,从从容容地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古老故事便在这里以形象幽默的表现,博得了人们的阵阵笑声。

这些活动的发起者、资助者当然是已被外姓家称为何掌柜的何星三,不过何姓人家的长辈们都尊敬地称其为“三先生”。何掌柜这天并不在现场,而他家里的热烈气氛并不亚于场子上。因为何夫人就在中午为他生下一子,这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三天之后,“三先生”家里又备了一桌酒席,按当地习俗,要给儿子做三朝,定时辰,取名号,所以,这桌酒席待的是两位特殊的贵宾,一个是何星三十几年前的私塾老师,本镇素有威望的徐先生,另一个是从离镇20里地的县城请来的号称“半仙”的算命先生,人称刘二先生。徐老先生应邀而来的主要任务是给新生儿取名选号,另一个当然就是来掐算八字,预

告富贵吉祥的。

为什么把他们二人同时请来，何星三的想法是让他们现场“合署办公”，算命先生掐算的八字中尚有什么缺陷的，就让徐老先生用名号来补充。

刘二先生受到这样的礼遇马上进入了角色，掐算了一阵子说：“贵子生于午年午月午日午时，占尽‘午’字是大福大贵之命，属马，也可以说是马年马月马日，书上说‘壬午癸酉杨柳木’是木命，水生木，金克木，命中缺水，水越多越好，徐老先生取名时多几个带水的字，切忌涉金。木为东，水主北，金主西；东、北主大贵，长大应到东边和北边做事。木生火，火主南，南方次之，切忌西行……”

奉承之词一大堆，谈得何星三心花怒放，连续茶敬烟。刘二先生背诵了一大通阴阳八字的顺口溜，徐老先生听进的只有“命中缺水”几个字。当刘还在滔滔不绝时，他已为小何少爷想好了字号，等刘二先生一住嘴，他一字一顿地讲解他的理由：“既然缺水则名取一个浚字，成浚者谓清除阻塞而联通也，字以‘雪舟’，雪者，水之精华也，从天而降，雅而不俗；他本命本依于水，取一舟字则可漂洋过海。”

何星三和刘二先生连连称妙，取名之事本来就可以这样结束了，而徐老先生因为高兴多喝了几杯，再加上他是何星三的老师就又少了一些顾忌，他说他还有很多感慨，想给大家再讲几个历史故事。

那个时候没有很多文化娱乐活动，听教书先生讲故事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情，大家自然没有反对的道理。徐老先生首先讲了端午节的来历，他说：“大家只知道端午节与屈原有关，其实不然，该节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只是屈原恰好在这一天投江罢了，所以人们在过端午节时顺带把屈子祭奠一番。”说得大家心头一凉，非常不理解老先生为什么把刚刚出生的小儿同屈原投江扯到了一起。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古人把五月五日称为恶节，是一年中最为可恶的一天，这一天出生的主大凶。《民俗通》上说‘五月五日生人，男害父，女害母’，所以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们规定凡在这一天出生的婴儿都将他们弃之不养。直至今日，每逢五月初五都要燃烧艾叶、饮雄黄酒以避邪。”

徐老先生因喝过两杯酒，一讲起历史来就进入“先生”的角色，所以没有注意其他人都睁大了眼睛，惊变了脸色。他端起茶呷了一口水又继续

讲道：“我们聪明的祖先啊，创造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唯此一点太荒唐、太残酷，终于有一天，一个人把它翻了个个儿，此后五月初五出生便成为一个大吉之日。”

“你们知道战国末期的齐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相国叫田婴吗？田婴的一个小妾于五月初五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田文。田婴问过出生日期之后毫不犹豫地令其妾将该子弃之荒郊野外。而这位母亲怜其骨肉，偷偷把孩子抚养成人，不料此子却极顶聪明，成人之后能言善辩，礼贤下士，成为一代名人，被齐王封为孟尝君。孟尝君以其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恶节’并不可恶，从此，该日投身尘世的孩子们便平安生存了下来。而且，有了孟尝君的先例，人们都认为这一天出生的人一生富贵，所以东晋末年王猛儿媳于五月初五添得一子，王猛听后大喜，大宴宾客之后亲给其孙取名王镇恶，其意为将古时所言恶节中的‘恶’镇住，这王镇恶后来果然帮助刘裕灭东晋而建南宋江山，被刘裕封为大将军。所以，此日出生的人能出相，武能封将，何掌柜也于该日喜得一子，日后必可封将出相，出人头地，恭喜恭喜！”

何星三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赶快答谢，同时心中也涌起了一道美丽的憧憬。

六年后，徐老先生的私塾中又增加一名瘦小的学生，这就是由他亲自取名选字的何成浚。

何家这时已经远近闻名，虽不是家财万贯，也可称得上富甲一方，按说一家人的吃喝绝不会成问题，然而小成浚在私塾里的十几个孩子当中，显得非常单薄，除了年龄小之外似乎是有些营养不良，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眼睛，纤纤的十指，纤纤的小辫。不过，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告诉人们，他早已到了应该读书的年龄。

据说入学的那一天，老先生专门用一个“弯弯绕”式的题目来测试这位出生吉日的小学生，他指着门外树上的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问何成浚，“那树上现有十只麻雀，若用铳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身后的几个大孩子们窃窃私语，有的说九只，有的说没有。老先生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他们的议论，又把和蔼的眼神给了何成浚。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何成浚记得清清楚楚，父亲不止一次告诉过他，说是铳一响，不管多少麻雀都飞走了，所以答案为零，但他想起他平时用弹弓打麻雀的情景。对这个答案持有异议，所以瞪着他的大眼睛看了看树上的麻

雀很坚定地说：“还有一只！”

他回答的数字完全出乎老先生的意料，不过也没有轻易责怪，而是很镇静追问了一句：“为何还有一只！”何成浚说：“铙一响，其他的麻雀都飞了，打死的那一只不能飞，要么挂在树上，要么掉在地上，所以说还剩一只。”

老先生的直觉告诉他：这孩子将来必是一个善辩的奇才！

后来的实际情况实实在在证明了老先生的直觉，小成浚读书果然极顶聪明，无论课文长短，每次首先背诵的总是何成浚，那些当初嫌他瘦小的大孩子们只能自叹不如。老先生也不止一次对人称赞这位得意门生：“此子必成大器，要么学富五车，要么封侯一方！”

何成浚的自我感觉也非常良好，所读诗书，几乎过目不忘。父亲也极为满意，每年给老先生的束修都比规定的要多出许多，而且逢年过节，都要把老先生请进家门，以上等贵客相待，要求多开一点“小灶”。

要是何成浚生于一个和平安宁的时代，成为一名“学富五车”的学者几乎被认为是迟早的事情，可是在他懂事之后，中国偏偏发生了一系列令国人脸红的事情，从而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1894年是甲午年，大清帝国为朝鲜问题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场著名的败仗，唯一的“战利品”是李鸿章从日本揣回了一本《马关条约》，此后，二亿两白银和台湾诸岛、辽东半岛全部送给了东洋人。

那个时候通信不发达，媒体也很落后，国家的大事一般都是“道听途说”，但读书人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是多一些。那天，徐老先生进课堂后，阴沉着脸，痴痴地坐了很久不说一句话，既而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孩子们以为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吓得不敢出声。最后，老先生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站了起来，眼镜片后的目光使全班同学打了一个寒颤。他像山洪爆发一样地说了话：“孩子们！耻辱啊！泱泱大清帝国却受一个小小日本的欺负，又是割地，又是赔银，怎么得了！”

接着先生向他的刚刚懂得一些世事的学生们讲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甲午海战的经过。最后又发表了一些感慨。他说：“我们过去一直称日本人为矮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中国人要是跟他们打架，一个要撩倒他们一群；论国家面积，他们就是那么三四个很小的海岛，我们中国跟他比起来，简直是西瓜之于鸡蛋，大象之于老鼠！论人口，我们要比他翻十番，哪里想到他们还敢来惹我们，那简直是兔子去咬老虎的屁股！可是，他

们去年连续跟我们大清帝国的海军干了两仗，两仗都把我们打得狼狈不堪！逼着我们赔款、割地，还在我们国内驻军，开设通商口岸！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反而成了他们的奴隶！”

老先生的话深深刺痛了刚满13岁的何成浚的心，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还会向一个小日本低头！

第二天，他上学去得很早，跑到先生的家里问原因。老先生告诉他，朝廷里当家的人把本来准备去买军舰的钱拿去修了“园子”，而日本人则把大把的钱花在军队建设上，他们的军舰比我们的快，比我们的大，他们的枪炮比我们的狠，比我们的凶，他们的军队也训练得比我们强，他们的火药枪也比我们的准，说打你的左眼就不打在右眼上！

何成浚听了先生这段不无夸张的话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被吓得瞪大了眼，而是又提出怎么才能打赢日本人问题，老先生叹着气说：“难啦，我们军队的元气已经大伤，十年八年想打赢别人简直不可能。嗨……只看你们长大了怎么样！”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何成浚从此便暗暗下定了从武的决心，他很天真地想，这么多中国人要踏平那么几个小岛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而且，他还天真地想，要打赢日本人就要练好水上功夫，将来争取去当一名海军。所以，春夏之际他一有空闲时间就到附近的厥水河中去练“水上功夫”。虽然他一生没能成为一名海军，但他的“水上功夫”还是发挥过作用的，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同学们坐快艇游海，一同学不慎落水，他毫不犹豫地翻身跳下去将这位同学救了上来，自此二人成了生死之交。这是后话。

1896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出自己的现代军事人才，在省城武昌开办了一所名叫“武备学堂”的初等军事学校。11月发布招生公告开始首批招生。



湖广总督张之洞